

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美食

秦味



墓室壁画《野宴图》。



↑《托果盘侍女图》中的“酥山”。

→新疆吐鲁番出土屏风画《弈棋仕女图》中一部分《托果盘侍女图》。

长安是万邦来朝的政治中心,众商辐辏的经济中心,文明交融碰撞的文化中心,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,不仅连接起欧亚大陆上的诸多文明,也连接起了各地的美食文化。今天,就来看看丝路上美味又有趣的饮食文化。

唐宫里寻找丝路美食印迹

早在唐代就有冰淇淋了,不过它的名字叫“酥山”。根据文献记载,酥山最底层应该是冰,上面覆盖着奶油、酥油,而所谓“酥”,是一

种乳制品,与我们今天的奶油、黄油大致接近,是从北方游牧民族传入中原。

在唐代,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小吃——杏酪酥,它以杏仁为主,辅以桂花、果仁、果粒,白嫩鲜滑,清新鲜甜,有美容养颜、清热解暑的功效。

在唐代贞观时期,唐太宗有感于西域蔗糖干燥易储,食用方便,希望中国也能够生产出这样的糖,于是派人去印度学习制糖技术,成功制出了品质远胜于西域的冰糖。高宗时期,又学习了制作精沙粒糖技术,类似于现在的白沙糖。

在唐代最受推崇的国民肉食也是羊肉,从王公贵族到普通老百姓都喜爱食羊。唐人吃羊肉的方法很多,比如“炙羊肉”,类似于现在的“烤羊肉串”,还有蒸羊头、羊肉面条等。《清异录》中说武则天爱吃“冷修羊”,它类似今天的白切羊肉。

羊肉串最好的搭档“胡饼”当然不能少了,一口饼子一口肉,这可是流传千年的绝美吃法。唐代时期,胡饼就是当时上流社会和僧俗百姓普遍喜爱的食物,风靡全社会。日本和尚圆仁的《入唐求法巡礼记》记唐文宗开成六年“立春节,赐胡饼、寺粥。时行胡饼,俗家亦然”。

风靡长安城的“进口”美食

唐代是一个食材非常丰富的时代,除了说到的糖、羊肉串、胡饼等从西域引进来的美食之外,凭借进贡体系和发达的交通网络,都城长安的帝王或贵族之家能够常年享受来自西域的物产。比如高昌来的马奶葡萄、安南来的槟榔和香蕉、新罗来的松子、摩揭陀来的胡椒等异域珍馐。突厥人曾向唐太宗进贡过马奶葡萄,一串有两尺长,不过《旧唐书》说起唐太宗破了高昌,在今天的吐鲁番一带,得到了高昌的葡萄酒。唐太宗亲自选定配方造酒,造出了八种不同的美酒,赐给臣下,长安人这才知道了葡萄酒的美味,唐诗所谓“葡萄美酒夜光杯”,是带有一点异域风情的。

唐代从波斯地区传到中国的食物,不止苜蓿和葡萄两种。比如有种东西叫“阿月浑子”,

很雅致的一个名字,其实就是今天的“开心果”。现在凡是食材名字前带有“胡”字的,大都是汉唐时期自西域进入的。如胡椒、胡桃(核桃)、胡瓜(黄瓜)、胡蒜(大蒜)、胡萝卜、胡豆(蚕豆等)、胡麻(亚麻)等等,当然也有大葱、菠菜、西瓜、石榴、洋葱等这些不带“胡”字的。

可见,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贸易路,更是一条美食路,来自西域的各类食材、调料成就了唐代美食的丰富多元和包罗万象,并对中原饮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,而这种影响在今天依然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。

悠悠茶香通西域

交流是相互的,传入了这么多,当然也有不少由中国传了出去,仅就食物而言,从我国传出去的有桃、杏、梨、枇杷、荔枝等水果,还有水稻、茶叶等,最重要的食物就是“茶叶”了。

唐代以前,茶大多为上层贵族所享用;到了唐代,饮茶之风才扩散至民间,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在当时,人饮茶成为社会风尚,正如《旧唐书·李元通》中所提到的:“茶为食物,无异米盐,于人所资,远近同俗。既怯渴乏,难舍斯须,田闾之间,嗜好尤甚。”

当时,不少城市已出现了专门卖茶的茶馆,还出现了专门用于饮茶的器具——茶盏。在唐代,茶具常被称为“茶碗(盃)”“茶瓯”。

茶叶最早传入西域的地区是吐鲁番。1972年出土于吐鲁番市阿斯塔那187号墓的屏风画《弈棋仕女图》,画面以弈棋贵妇为中心人物,围绕弈棋又有侍婢应候、儿童嬉戏等内容,反映了唐代西域女子充满闲情逸致的休闲娱乐生活。

20世纪50年代以来,在吐鲁番唐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彩绘木杯、陶杯,都是可以用于饮茶的器具。

朗朗神州,祚传千载。漫漫丝路,泽遗百代。如果说丝绸之路带来更多的物种、原料或调料,而大唐回馈于世界的则是利用这些物种、原料或调料,创造出多姿多彩的唐代风味和特色美食,而这些美食正续写着这条探索之路、贸易之路、友谊之路、文明之路的新篇章。 □王蓉静

杜斌丞与刘志丹

1930年,杨虎城率师回陕,兼任陕、甘两省军政长官之后,杜斌丞先生先后担任了陕、甘两省重要职务。在此期间,他对刘志丹、谢子长等同志革命事业的支持和保护不遗余力,利用合法地位不仅在经济上给予资助,而且还送了一批枪支弹药。

刘志丹是杜斌丞先生任榆中校长时的学生,后入黄埔军校。1927年初,刘志丹回到西北,在国民联军任政治处长。1931年,刘志丹任甘肃军阀苏雨生旅的团长,驻旬邑郿田镇集结分散的革命同志,打击当地的豪绅地主。当时,郿田镇有个姓刘的劣绅横行暴敛,民众呼声很大。这个劣绅企图收买刘志丹作为靠山以鱼肉乡民。刘志丹义正词严,当面戳穿他的阴谋,给予严惩。他抗粮不交,上吊自杀了。这一件事引起了当地豪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极端恐惧和仇视,他们借机煽动苏雨生,说刘志丹是共产党,野心勃勃,制造分裂,要夺苏雨生的团子。苏雨生一怒之下缴了刘的枪,将他扣押在牢房,声言要杀他。

杜斌丞先生在西安得知消息,立即致电十七路军总部,申述事因真相,并叫苏旅驻西安办事处处长谷逢芳去彬县对苏雨生说:“刘志丹是我的学生,你们能合作就合作,不能合作就各走各的路,扣押他干什么?”同时,因事去兰州,途经彬县,又专门见了苏雨生,亲自督促苏雨生释放了刘志丹。

经过杜斌丞先生的极力营救,刘志丹被释放后再次见到了自己的师长。杜斌丞进一步了解了刘志丹的处境和想法,随即解囊相助,当面赠给他银五十元、手枪一支,鼓励他增强信念,排除困难,坚定武装革命的方向。尔后,刘志丹领导创建了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。

1931年初冬,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在南梁处于困境,一方面和省委接不上关系,另一方面天气渐冷,部队缺少衣服和弹药,难以过冬。经过工委研究,刘志丹派马云泽去平凉想办法解决军需物资。当时,杜斌丞先生因公正在平凉,当他见到马云泽,了解了刘志丹的困难后,四处活动,直到盘踞在陇东的军阀陈珪璋和其他人,为游击队搞到一大批服装、弹药和子弹袋。同时,杜斌丞先生还自己出钱购买了一些枪支弹药送给了游击队。

□杜理丞 马云泽/口述 李长江/整理

古代厕所啥模样

古代的厕所啥模样?古人如厕时有哪些讲究?又形成了什么样的文明风尚?在汉中市出土的两件陪葬文物上,这些问题有了答案。

汉中市勉县博物馆的“镇馆之宝”东汉灰陶四合院建筑模型,1978年出土于勉县老道镇沙家庄村。这套模型分为主体庭院和偏院两大部分,主房、围房、粮仓、禽圈等一应俱全,功能完善,且设计合理,是研究我国东汉时期建筑形制的稀世标本。

作为汉朝时期的陪葬品,灰陶四合院反映出当时的用厕风尚:模型二楼的围房旁,设有一个带阶梯厕所,推测为女性专用,仔细观察会发现,在厕所后下方留有一个出口。“汉朝时期,没有自来水,也没有上下水系统,由此推断,在卫生间的一层处,会有人及时定期放置并更换马桶。”勉县博物馆馆长肖勇勤介绍说。

设计更为巧妙的是,厕所脚踏板上的防滑刻痕至今依然清晰可见,所有的门板、门栓仍能自由拆卸,侧墙还留有通风口。“这种陪葬品其实没有任何实用功能,仅为仪式上的象征性道具,但其设计的精细程度,能反映出当时墓主人阶层比较讲究的用厕风尚。”肖勇勤说。

另一件陪葬文物是出土于汉中东季丰村的汉代绿釉陶厕,高40厘米,长22.5厘米,宽15.5厘米,材质为红陶质,通体施绿釉,悬山式屋顶。“虽然是陶质冥器,但汉代葬俗的中心思想之一就是‘视死如生’,因此这件厕所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出当时人们的起居习惯。”汉中市博物馆馆长卢辉说。

汉代绿釉陶厕呈现出的最明显特征是男女分厕:山墙正面开双门,双门之间有墙隔,设两台阶,为的是上下便利;屋内以屋脊为中线,用隔墙将室内一分为二,分别为男厕、女厕,说明汉代人对于清洁卫生条件颇为讲究。

“在墙体的左右两侧,各置有半圆形窗户,用以通风透气。”卢辉说,“厕所室内的地面上,各开有通往地下的长方形孔,孔两侧有垫脚砖。陶厕四角下方塑四方足,使建筑悬空,整体风格古朴典雅,设计科学合理。”

“有男厕、女厕之分,建筑形制也较为讲究,通风、蹲位等设施完善,表明墓主人生前有较高的社会地位,反映了汉代汉社会中生活的文明程度。其科学的设计、精良的制作,展现了古代先民的智慧。”卢辉说。 □孙正好



灰陶四合院围房旁的厕所(二层右二建筑),侧墙设置了通风口,一楼底部留有换置马桶的洞口。

西安这几个地方叫“门”却没有“门”

西安众多的地名,都承载着丰富厚重的文化内涵,其中就有不少以“门”命名,却看不到“门”的地方。

后宰门

后宰门,位于西安市新城区北大街北段东侧,东至革命公园西门,明代秦王府北门东段与北新街相交十字,称为“后宰门”。

古时,专管王室衣食供给的机构,称为“后宰”。据说当时,凡是王室需要采购的日用品,后勤运输都是经过这里进入王府。此外,后宰门也曾是许多秦腔艺术大师的会聚之地,是当时老百姓嘴里的“秦腔窝子”。其中,被戏剧界誉为“当代关汉卿”的范紫东先生就曾居住于此。范紫东先生和一群戏曲爱好者创立了秦腔科班易俗社,历经四十多年,撰写了多个经典秦腔剧本,包括《三滴血》《颐和园》等。

后宰门附近有一座公园、两所医院以及四所学校,甚至有的人从出生直到高中,都是在这条巷子中度过的,可以说,后宰门也承载着无数老西安人的青春。

端履门

从文昌门到东大街,南半段是柏树林,北半段则是端履门。历史上的端履门是一个闹

中有静的巷子,明清乃至民国时期,这里居住的都是官宦大户。

叫端履门却已经没有门了,不过它的起源却是因为“门”。明朝初年,秦王朱棣在西安城内建秦王府。进入秦王府的正门,有一个牌楼,各位官员在牌楼之前正冠端履,听候召喚。久而久之,端履门的名字就形成了。

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,端履门牌楼早在清朝初期就消失了。在民国时期,这里不时能看到一些踞着石狮子的门楼,虽然残破,但能依稀可见当年的派头。

如今的端履门内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大宅,而成为居民院子。如果你从那里经过,或许能听到不少老西安人还习惯把端“履门”门读成端“礼”门。

书院门

书院门,是一条长度不过几百米的小巷子,这里不仅承载着上千年的历史,也描绘出了最书卷气、最安逸的老城生活。如果要评选最能代表西安特色的一条老街,书院门必定榜上有名。

这里之所以叫书院门,是因为这条街原本是一条通往“关中书院”的街道。关中书



院是明清两代三秦大地的最高学府,也是全国四大著名书院之一,更是名列“西北书院之冠”。行走在书院门的青石板路上,书画小摊林立两边,各位书法、国画高手留存的翰墨丹青,著名文学家的历史故居,还有卖纸笔墨砚、西安特色工艺品的铺子,一路墨香阵阵。

在互联网的推广下,如今的书院门人群络绎不绝,更有不少画家聚集于此,现场作画。当你疲惫于城市里的喧嚣时,这里不失为一个“避风港”,闻闻书香墨香,听听关于老西安的故事。

贡院门

贡院门,位于西大街西段北侧,儿童公园正南,南起西大街,北至西院巷。据《西安地名故事志》记载,开拓于明景泰年间,因直通“贡院”而得名。

“贡院”是明清时陕西省举行乡试会试的场所。古代给皇帝礼品都叫“进贡”,而

神木官碱局拾遗

钩沉

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,欧洲列强无暇东顾,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,对华输出的资本和商品都有所减少,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,中国民族工业迎来短暂的春天,神木碱厂应运而生。

神木向来贫瘠,本不出碱,因与内蒙古接壤,蒙地富产碱土,其人不善挖取,又不能熬熬,运贩来皆系神木人承办。嘉庆十六年(1811)《秦清陕西榆林府采碱之禁以裕边民生计事》载:“查榆林府属之神木县界连口外鄂尔多斯,地方向来产有碱土,通商转运内地,贫民肩挑背负,藉资糊口。”认为“因阻于功令,蒙民无从售卖,汉民不敢挑挖,是货委于地”,请求放开采碱之禁以裕边民生计。

神木碱土主要来源于两处湖泊,一处为察哈淖儿,即大淖,前后面积纵三十余里,横十余里;一处为阿肯淖儿,即小淖,面积约五方里。察哈淖儿碱土性刚,阿肯淖儿碱土性柔且多盐质,夏秋水多,碱没于水。至冬北风大起,水涸而碱生,或四五寸,或七八寸,或尺余不等,或一年一出,或数年一出。一年所出之土,数百年用之不尽,加之工艺上改良进步、精益求精,成为边外的一大财源。熬碱时须以察哈淖儿碱七成、阿肯淖儿碱三成,如只用察哈淖儿碱熬制,则色暗而易裂;如只用阿肯淖儿碱熬制,则味咸而易飞,配合熬煮方可色味俱佳。先将碱化而

为水,去净沙土,入釜上煮。待水汽尽,移入范中成锭,每锭八十五斤左右。碱土上者,每斗可熬二十五斤,劣者不过十五斤,成锭后运至县城及高家堡销售,后被直隶、山西、河南等地商人购买,销路畅旺。道光《神木县志》载:“第各省俱出碱,而质性高深无逾斯地,此番碱之所以驰名也。”《神木乡土志》载:“神木碱产于神木边外,质性高洁,他省所产之碱均远逊焉。红碱适于染色洗涤等工作,白碱为制造面食掺用品。白碱设官局开办,销路颇畅。”

清代中叶,高家堡商人韩世恭等在瑶镇设厂,自内蒙古札萨克旗拉取碱土,溶解后取水熬煮,制成碱锭,行销各地,谓之“番碱”。清光绪二十六年(1900),省拨开办银三万两,委派委员在瑶镇草沟创修房屋,购置用器及原料,当年秋开始熬碱。清光绪二十八年(1902)冬开放大淖,采取碱土。后逢八国联军入侵北京,慈禧太后出逃西安,一路支应浩繁。陕西为筹措这笔开支,派四川籍官僚张秋萍来县,将瑶镇碱厂收归官办,取名神木官碱局,声言投资白银十多万,招工二百余人。“民国”十六年(1927)国民军八十六师师长井岳秀趁碱厂资金困难,投资入股,改官办为官商合办,由官商双方各委推举一人主持,实际由他一人包揽。井岳秀接办以来,严加整顿,产量日益增加,营业颇有蒸蒸日上之势,每天销售两万余

锭之多,因质地精细,高价卖于天津造胰各厂。民国二十一年(1932)所租巴彦淖碱土一百多万斤,除民国二十二年(1933)所运回十余万斤外,下余八十余万斤,于民国二十三年(1934)春回陆续运回,后于本年二月间与鄂套旗属察哈淖儿天成鸿记租定碱土五十二万斤,租银四百元,碱土陆续发回。民国二十五年(1936)井岳秀暴死之后,碱厂复如旧态。民国二十九年(1940)陕西省企业公司接管,改名陕西省企业公司神木碱厂,实行官商合办。民国三十三年(1944)十月,陕西省政府正式批准修正了《公商合办章程》。此时腐败之风更盛,产品质量低劣,销路滞塞,碱厂一蹶不振,终致倒闭。

注资方面,民国十年(1921)为两万元,民国十九年(1930)为三万元,民国二十九年(1940)为二百万元,民国三十四年(1945)商股退出后,厂家除固定资本外(房产、家具等),仅有活动资金数十万元。

民国二十九年(1940),高家堡商人刘大荣、杭万礼、寇瑞生于红碱淖畔马莲河村合资兴办的“三盛长”碱坊。他们注重产品质量,销路畅通,生意兴隆。1949年,人民政府与“三盛长”碱坊协商,将其改为公私合营陕北榆神碱厂,直属榆林专区,并将原神木官碱局财产合并其内。

神木官碱局成立后命运多舛,屡遭匪患。

民国二年(1913),遭匪劫掠,损失款一万余两。民国四年(1915)五月,套匪卢占奎作乱,将实木房厂用具劫焚一空。民国五年(1916)重盖房屋,补修家居,又行熬制。民国六年(1917)芦匪又至,将芦草沟房屋用具损毁过半。民国十三年(1924)腊月某日晚,土匪四十名,各持枪械,一拥进局。局内人员越墙逃走,匪徒恣意掳掠,银钱、衣物多被抢去。本地驻军得报告后派兵往捕,匪已远去。后由驻军下令四下搜捕,拿获匪犯四名,审讯得实,依法惩办。

神木碱厂历经风风雨雨,由盛及衰,是大环境使然,更因为官僚资本进行经济垄断,残酷挤压民族工业,苛捐杂税不断增加,通货膨胀导致原料昂贵产品滞销,因为资金少、规模小、技术力量薄弱、管理经验缺乏等,注定无法摆脱逐渐萧条的厄运,在步履维艰中迷失前行航向,又悄无声息地退出历史。但它毕竟跨越了峥嵘变幻岁月,播撒了实业救国思想,开启了民族工业先河,唤醒了中华自强之梦,成为神木近现代工业的缩影。

旧迹依然可循,向人们述说兴衰过往。大道之行,壮阔无垠;大道如砥,行者无疆。先辈们胸怀四海矢志求索,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精神将长久地光耀麟州大地,激励千秋万代。 □曹斌